



杨献珍文集

I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杨献珍文集

①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献珍文集 / 杨献珍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12

ISBN 7-202-03240-6

I. 杨… II. 杨… III. ①杨献珍-文集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③读书笔记④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09 号

书 名 杨献珍文集(I · II · III)

责任编辑 李保平 董宝生 李剑霞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馨 宇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625

插 页 12

字 数 1326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02-03240-6/B·163

定 价 1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杨献珍同志 1983 年 7 月在中央党校礼堂讲课



杨献珍同志(左)与张曼萍同志 1936 年 9 月同时出狱后在北平合影。张曼萍同志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中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的哲学理论也不同于以往的哲学，
他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这
是被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所不能容许的。
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结为辩证
唯物论上反对唯心论，拥护唯物论。
而唯物论在辩证法中，却不能坚持
唯物论的原则和方法，而坚持唯心论
的原则。这样就会发生矛盾。所以，
朱熹的哲学在唯物论上反对唯心论的
唯物论是正确的，但对唯物论的唯心论
的唯物论是错误的。因为唯物论的唯心论
的唯物论而自己也不知道。这就叫做
自相矛盾。

陈先生说的哲学，在辩证法上，
中国传统的唯物论，而它的与西方的
传统的唯物论的根本的区别，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的根本的区别，中宋的程子也是主张
辩证法中唯物论的根本的区别，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的区别，而
陈先生说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的区别，即本末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文的手迹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用箋

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

我的「個人研究計劃」，現在還訂不出來。因為我自己一方面擔任着自給自足的教育行政工作，一方面還擔任着肩負複雜的工作，教導，不只光在本校，還有校外的，去處也琳琅滿目。想制定一個^較詳細的研究，但時間支配的還真。在他們當初沒有寫明，多以為黨和國家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而高級幹部，卻想，在他們之間進行唯物主義的訓練。這件事情，在推動全國的唯物主義宣傳工作會要起一定作用的。因為根據已經的經驗，任何一種運動，沒有黨的高一級的領導，是不行的。跑來我們就相處了這樣一個工作：希望我們空和

杨献珍同志 1955 年 11 月 1 日写给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信

箋用校級黨中央直屬高級校

國家的幹部和黨員階級的歷史和歷史學的知識。他們
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之後，認識了哲學的重
要性，認識了哲學和社會主義正確的關係，認識了哲學和
一般實際工作的重要，這樣，他們再回到工作崗位之後，就
會主動地、積極地去應用所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知識。
譬如拿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書來說，我們的編輯部就經常利用作各
項工作的參考。今年已經開始，我自己這思想：在過去的
我邊作巨件事，向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宣傳唯物主義，把我
自己的許多哲理教出來，不僅哲學在松子同學學習唯物主義，而且
且帮助在我幹部所的唯物主義的學習。我自己日以兩三小時

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用箋

先立好一个个人工作计划。至于研究计划，我有一个想法，但怕不尽如人意，校长又会拿把柄，所以也不敢拿出来。昨日个人工作计划，希望你斧正以备考。

敬礼！

楊成江
十一月三日

出版说明

杨献珍同志是我国 20 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从 1940 年起半个世纪里，在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许多重要哲学论争都和他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今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都无法绕开他。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社于 1980 年出版了杨献珍同志的名著《什么是唯物主义？》，1984 年出版了《杨献珍文集》Ⅰ，1986 年出版了《杨献珍文集》Ⅱ。当时杨献珍同志亲自审订修改了收入《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篇校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文集》Ⅲ迟迟未能编纂完毕。直至 2001 年，编者方与我社联系《文集》Ⅲ的出版事宜。

鉴于《杨献珍文集》Ⅰ、Ⅱ均在我社出版，我们同意继续出版《文集》Ⅲ，并和编纂者达成了共识。又鉴于《文集》Ⅰ、Ⅱ出版已有 10 多年，且未重印过，为了给读者提供便利，我们决定将已出版的《文集》Ⅰ、Ⅱ和准备出版的《文集》Ⅲ一并推出，依次编为《杨献珍文集》Ⅰ、Ⅱ、Ⅲ。《杨献珍文集》Ⅰ、Ⅱ除因体例原因作个别技术处理而外，一律保持原貌，可称之为重印。我们愿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辞世 10 周年的杨献珍同志的敬意和缅怀之情。

《杨献珍文集》依时间顺序收入了从 1940 年至 1990 年 50 年中作者的主要文章、论著、讲稿、读书笔记及重要书信共 95 篇。

其中《文集》Ⅰ、Ⅱ主要收录杨献珍同志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运用于党校的创办、管理和教学的理论方针，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研究的文章41篇。如《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什么是唯物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解说》等。《文集》Ⅲ主要收录杨献珍同志1967年在狱中及其平反后所写的理论文章54篇。特别是关于三个著名哲学理论的文章，即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合二而一”问题、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得到公开发表。所选入的这些文章反映了杨献珍同志当时的思想观点和斗争精神。由于《文集》Ⅲ是在杨献珍同志辞世后编成的，为了给后人提供一部完整的研究资料，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文章的原有历史风貌。

从杨献珍同志的文章、论著、讲稿、读书笔记和书信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我们期盼《杨献珍文集》的出版对于人们不懈地追求真理，与时俱进，能有所助益。

《杨献珍文集》Ⅰ、《杨献珍文集》Ⅱ出版时，责任编辑是许爱仙、李保平。因许爱仙同志已调离我社多年，这次三卷本又改用一个书号，有许多具体技术工作要做，经许爱仙同志提议，责任编辑中不再署她的名字，谨此说明，并向许爱仙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

前　　言

杨献珍同志 1896 年 7 月生，1992 年 8 月逝世，终年 97 岁。他是中国 20 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在他的一生中，从事过国民教育工作、党的秘密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武装斗争工作，很长时期是主持党校工作并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教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哲学理论，对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左”的错误统治时期，受到三次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被监禁在北京白庙监狱 8 年，后又流放陕西潼关 3 年。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央为“六十一人案”平反，12 月 17 日由流放地回到北京，1979 年 1 月中共中央专电“任命杨献珍同志为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80 年 8 月 4 日中央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杨献珍同志一生所写的文章和讲稿有 200 余篇。

1979 年由杨献珍的学生李唯一、马洪谟、王哲民、艾恒武和杨献珍之子杨欣组成工作小组，收集、整理、编辑《杨献珍文集》。收入《杨献珍文集》的有 95 篇，约 130 万字，按时间顺序分 I、II、III 部分。

《文集》I 是由马洪谟和杨琪整理的，于 1984 年 3 月出版。《文集》II 是由艾恒武提出目录，收集稿件，和张启华合作初编后，又由马洪谟编辑，1986 年 7 月出版。这两集是由李唯一同志通审，杨老定稿。《文集》III 是由艾恒武提出目录后，由马洪

谋编辑。由于马洪谋患病，丧失工作能力，此项工作一直未能进行。马洪谋逝世后，由杨欣把拟收入《文集》Ⅲ的文稿找回，并在《杨献珍传》编写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杨献珍文集》Ⅲ的编辑工作，建议由艾恒武来完成。杨欣的意见得到《杨献珍传》编写小组同志的一致赞同，于是艾恒武接受了此项工作。收入《文集》Ⅲ的许多稿件是由杨欣提供的，稿件的使用，也是艾恒武和杨欣共同商量定的。《杨献珍文集》Ⅲ实际上是艾恒武和杨欣两人共同整理的。

杨献珍同志的著作基本上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论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运用于党校的创办、管理和教学的理论方针的文章；以及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研究和论战的著作。收入《文集》Ⅰ、Ⅱ的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党校教育和理论教学方面的文章；收入《文集》Ⅲ的主要是有关他所坚持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三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而一”（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杨献珍的这三个理论问题，在“左”的错误统治时期是受到错误批判的。康生把这种批判概括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关于这三个哲学问题的文章，作为讲稿写出，当时并未发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进行总的攻击时，他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和权利了。关于杨献珍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言论最早在报刊上出现，是由批判者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的手法，从杨献珍的文章中片面摘取其

批判所需要的部分言论，在报刊上公布，同时进行所谓“批判”的。“文革”时期，更是给杨献珍捏造种种罪状和罪名，进行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杨献珍只能采取申述和抗议的形式，如向中央写信，向中央专案组写抗议材料等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对那些错误的批判进行批驳。“文革”结束后，杨献珍恢复了自由，有了发言权，才在各种报刊上和书籍中，发表了他的申述和抗议；对那些还在沿用断章取义偷换命题的手法或通过篡改党校的历史事实而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继续歪曲进行“批判”者进行了反批判，等等。杨献珍的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校教育家的风范和坚定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尚品格，而且还是研究现代中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

这次在编辑《文集》Ⅲ时，我们发现有些有关杨献珍的资料，在杨献珍逝世后，未能从有关人手中收回来，杨献珍家中保存的报刊上刊登的杨献珍的文章，有些也被人撕去拿走，找不到了。所以，《文集》Ⅲ收集的文章，不是很全，特向读者作如上说明。

编者

2001年5月

目 录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	(1)
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		
(1941年7月25日)	(23)
附记:	(30)
数一数我们的家当（1943年5月）	(35)
附：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出版	(49)
关于对事务工作的认识问题（1947年1月12日）	(66)
关于“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3月27日）	(83)
再谈“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4月8日）	(100)
关于真理、经验主义、新老干部的关系及动		
机与效果的问题（1947年4月）	(120)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47年5月）	(152)
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出发点（1947年）	(187)
平定荫营村的情况（1947年5月27日）	(196)
边府民教处及公安管理处是怎样“整”党的？		
(1947年12月)	(201)
加强财经工作者的群众观点（1947年8月24日）	(217)
何谓理论与实际联系？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1948年冬)	(223)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1949年6月6日)	(244)
珍重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1951年9月15日)	(277)
附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	
基层组织的决议 (1951年4月9日)	
(摘录)	(291)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1951年12月1日)	(294)
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	(313)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1954年3月2日)	(356)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	
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1955年5月21日)	(36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问题 (1955年6月23日)	(396)
什么是唯物主义 (1955年)	(428)
(一) 引言	(428)
(二) 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	
关系问题	(473)
(三) 关于真理问题	(545)
(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570)
(五)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576)
(六) 关于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582)
(七) 自由与必然	(594)
(八) 空间与时间	(602)
(九) 关于党性问题	(611)
关于做什么学什么 (1956年1月)	(615)
关于整风问题 (1956年)	(617)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

(1940年1月)

去年(1939年)12月，晋西与晋东南同时发生旧军进攻抗日新军、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的非常事变。这件事决不能看做只是山西内部磨擦的问题。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变，是中国自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它和发生在湖南的平江惨案，河南的确山惨案，河北的张荫梧打八路军，山东的秦启荣打游击队，鄂东的程汝怀惨杀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一样，是大规模的反共逆流的一条支流。十二月政变是山西的分裂与团结、投降与抗战分野的开始，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假若自己还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所应当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秋林方面：12月20日新派代表梁化之亲率武装将牺盟总部负责人全部监视起来，将政治部的卫队全部缴械，一切进步的东西被摧毁尽净。就是公开地宣告了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之终结，宣告了它们从抗战阵营中转向投降与反革命。同时山西的投降活动又是全国反共投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政变又预示了全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某种程度的进步性之终结。自从梁化之由重庆回到秋林，说得非常好

* 这篇文章曾在1940年2月间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连载过。